

清遺民經學家寓居香港時期的史學視野 ——區大典《史略》考索

許振興*

(收稿日期：100年9月30日；接受刊登日期：100年12月16日)

提要

中華民國建立後，不少清遺民都會借助多式多樣的方法表達他們擁戴清朝的政治立場與道德取態。廣東籍的清遺民因著地緣的關係，相率移居清廷在鴉片戰爭後被迫割讓給英國的香港。他們在此英國殖民管治下的地方形成特有的「社交圈」，致力學術研究、詩文創作與史籍方志的編修。他們尤著意於教育工作與儒家思想的弘揚。區大典(1877—1937)是這群寓居香港的廣東籍清遺民中長期從事經學教育工作的經學家。他編撰成書的經學著述十二種與子學著述《老子講義》均已受到學者的重視。本文則擬藉區大典編撰、今坊間已難得一見的一冊歷史教科書——《史略》，窺探此位清遺民經學家寓居香港期間的史學視野。

關鍵詞：清遺民、經學家、香港大學、區大典、史略

*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

一、前言

被歸類為「歷史上一個特殊的群體，忠於前代，不仕新朝」¹的清遺民在中華民國建立後紛紛借助多式多樣的方法表達他們的政治立場與道德取態。廣東籍的清遺民因著地緣的關係，相率移居清廷在鴉片戰爭後被迫割讓給英國的香港。他們在此英國殖民管治下的地方形成特有的「社交圈」，呼朋引類、徵歌逐色、詩酒唱酬、附庸風雅，甚至彼此聯姻，最後終老此地。²他們寓居香港期間，尤多致力於傳統文化的捍衛、保存與推廣。論者嘗以廣東籍清遺民的主要共同特點為學術研究不斷、詩文創作豐富、編修史籍方志不輟、從事教育工作不懈與努力弘揚儒家思想。³但這群寓居香港的廣東籍清遺民中，真正從事經學研究者實在屈指可數。區大典（1877—1937）雖不是這遺民群體中唯一的經學家，卻是在香港長期從事經學教育工作超逾四分一世紀，並編撰完成經學著述十二種的唯一一位。由是，識者多偏於重視他的經學成就。其實，他傳世的著述，除了若干散篇文章與頗受學者重視的《老子講義》外，還有坊間難得一見的一冊歷史教科書——《史略》。本文便試圖藉著此冊小書，管窺此位清遺民經學家寓居香港期間的史學視野。

二、區大典的生平與著述

區大典是清末以來香港有數的經學家。他是廣東南海人，字慎輝，號徽五，晚年復自號為「遺史」、「遺史氏」。他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登癸卯榜進士後，獲授翰林院編修。他於辛亥革命後舉家移居香港，並在1913年得老師吳道鎔（1853—1936）舉薦，與同年登進士第的同門廣東增城人賴際熙（1865—1937）同時受聘於剛成立的香港大學

¹ 孫艷：〈明、清遺民詩人評價褒貶懸殊原因簡析——以顧炎武、沈曾植為例〉，《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2010年5月），頁60。

² 有關清遺民在香港的生活狀況，歷來論者不多。相關的記述，可參看陳謙撰：《香港舊事見聞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頁348-389。

³ 參看彭海鈴撰：《汪兆鏞與近代粵澳文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頁2-6。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文學院 (Faculty of Arts), 擔任「傳統漢文 (Classical Chinese)」課程的漢文講師, 分別講授經學與史學課程。當時大學的四年學制被區分為中期課程 (Intermediate Course) 與終期課程 (Final Course) 兩階段。學生修習中期課程的時間不得少於兩學年。⁴採漢語授課的「傳統漢文 (Classical Chinese)」課程由「史學 (History)」與「文學 (Literature)」兩科目組成。賴際熙負責講授的「史學 (History)」一科, 選用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通典》、《通考》、《通志》、《通鑑輯覽》與宋、元、明的歷史載錄作教材, 按時序講授三代至東晉 (中期課程) 與南北朝至明朝 (終期課程) 的歷史。區大典負責講授的「文學 (Literature)」一科, 則選用朱熹 (1130—1200) 等學者的評註作教材, 逐一闡釋《四書》 (中期課程) 與《五經》 (終期課程) 的要義。⁵由於校方既無法否定中國經、史學的傳統, 又不能漠視「經學」與「史學」都不屬於西方現代學術分科門類的事實,⁶故在教學安排上只能採用模糊處理的權宜方法, 容許賴際熙與區大典假「史學 (History)」與「文學 (Literature)」的名義講授中國傳統的經學與史學。區大典便是藉此因緣際會在香港大學開展他的經學教育事業。

由於香港大學採用英語作主要授課語言, 對學生的漢文教育根本毫不重視,⁷是以校

⁴ 參看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lendar, 1913-14* (Hong Kong: The Newspaper Enterprise Ltd., 1914), p.59.

⁵ 參看 *Calendar, 1913-14*, pp.60&63;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lendar, 1914-15* (Hong Kong: The Newspaper Enterprise Ltd., 1915), pp.73&77.

⁶ 傳統「經史之學」的「史學」與現代學術分科的「歷史」、「歷史學」並不完全相同, 相關論析可參看李紀祥的〈以「史」為學與以「歷史」為學〉(載氏撰:《時間·歷史·敘事——史學傳統與歷史理論再思》, 臺北: 麥田出版, 2001年9月, 頁43-63)一文。「經學」與現代學科分類的關係, 陳以愛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一份「新國學」的研究綱領〉(載黃清連編:《結網編》, 臺北: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 頁519-571)論析頗詳。有關現代學術分科與傳統學科的相互關係, 左玉河的《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4年10月)與《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年3月)二書分析入微, 頗便參考。

⁷ 香港大學落實採用英語作主要授課語言一事, 可參看 Frederick J. D. Lugard: *Souvenir presented by Sir Hormusjee N. Mody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Hongkong University to commemorate the laying of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the Hongkong University building by His Excellency Sir F. J. D. Lugard, K.C.M.G., C.B., D.S.O., Governor of the Colony on Wednesday, 16th March, 1910* (reprinted with speeches at the ceremony, and illustrations, Hong Kong: Noronha & Co., 1910), pp.4-5. 香港大學根本不重視學生的漢文教育事, 可參看 Frederick J. D. Lugard: "Memo. By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Enclosure 8 of C.P. Carter: *Report of Sub-committee: Hongkong, 25th September, 1908*, in Hong Kong, Committe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versity for Hong Kong: *Papers relative to the proposed Hongkong University* (Hong Kong: Noronha & Co., 1908), pp. 16-19.

方一直只願採用量時計酬的方式聘請賴際熙與區大典擔任文學院的漢文講師。他們兩人為維持生計，只能同時兼任其他漢文學校的教席。1926年初，當時的教育司活雅倫（A. E. Wood）深感大學開辦多年，各科成績卓著，只有文科中的「漢文」一科無甚足觀，遂決定著手改善大學學生的漢文程度，一力要求大學聘任賴、區二人為專任漢文講師，俾令他們免卻兼職苦惱的同時，能專心提升大學生的漢文水平。⁸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便是藉著賴際熙的奔走籌款，在1927年正式成立。⁹賴際熙隨即被大學委任為學院的中國史學教授（Reader in Chinese History），而區大典則獲委為學院的中國文學教授（Reader in Chinese Literature）。¹⁰此後差不多十年的光景，區大典一心一意在香港大學從事經學教育。1937年1月，他自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正式退休後不久，便在同年7月23日（夏曆六月十六日）寅時辭世。¹¹由於他一生處事低調，後世對他的生平知者不多。鄧又同（1915—2003）編撰的〈區大典太史事略〉已是目前得見最詳盡的相關記載：

區太史，南海人，字慎輝，號徽五。一八七七年生，光緒丁酉（光緒二十三年，1897）科舉孝廉，光緒廿九年癸卯科會試，賜進士出身，授翰林院編修。辛亥後移居香港，先後在皇仁書院等官校授中文，其後受聘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授經史多年，曾任尊經學校校長，致力發揚經學，保存國粹，與增城賴際熙太史同其旨趣。課餘恆研《易》學，私淑漢管寧（158—241）之行誼。著有《易經要義》、《經學講義》等書。常臨學海書樓講經學，弘揚儒學，青年學子獲益良多焉。¹²

同是寓居香港的前清翰林岑光樾（1876—1960）於區大典逝世後親撰〈輓區徽五前輩〉聯語，稱：

⁸ 參看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lendar, 1926* (Hong Kong: The Newspaper Enterprise Ltd., 1926), pp.122-124；王齊樂撰：《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6年9月），頁270。

⁹ 有關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的詳情，可參看程美寶：〈庚子賠款與香港大學的中文教育——二三十年代香港與中英關係的一個側面〉，《中山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1998年12月），頁60-73；區志堅：〈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背景之研究〉，《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第4期（2006年），頁29-57。

¹⁰ 參看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lendar, 1927* (Hong Kong: The Newspaper Enterprise Ltd., 1927), p.144.

¹¹ 此據區大典家人發佈的訃文，《香港工商日報》，1937年7月24日，第1張第1版。陳君葆（1898—1983）傳世的《陳君葆日記》亦有相同的記載（謝榮滾主編，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年4月，頁296）。此資料承駱為孺先生提供，謹致謝忱。

¹² 鄧又同輯錄：《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香港：學海書樓，1991年11月），頁33。

下筆輒千言，遺史每多憂世論；知交齊一慟，尊經誰續等身書。¹³

短短二十四字，具體而微地概括了他一生最顯著的特點與貢獻。

區大典著述等身，除〈易經要義〉、〈周易揲著求卦法及經傳所載筮易占驗解說〉、¹⁴〈博文雜誌前序〉、¹⁵〈平山先生像贊〉、〈題黃節母秋燈課子圖〉¹⁶等散篇外，經學著述《易經講義》、《書經講義》、《詩經講義》、《儀禮禮記合編講義》、《周官經講義》、《春秋三傳講義》、《孝經通義》、《大學講義》、《中庸講義》、《論語講義》、《孟子通義》、《論語通義》與子學著述《老子講義》都是他任教香港大學時期講學多年的成果，故被後人合稱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經學講義》。¹⁷此外，他更曾為香港實業學堂漢文師範科的第一年級學生編寫了歷史教科書《史略》一冊。¹⁸這足見他雖以經學聞名於世，而學問實不囿於經學。

三、區大典的《史略》

《史略》一書世罕流傳，今所得見的版本未見標示刊印年月。由於書的封面除以大字題上書名「史略」二字外，尚以較小字體題上「香港實業學堂漢文師範科」、「第一年級講

¹³ 岑光樾撰，岑公煥編：《鶴禪集》（香港：自印本，1984年），頁116。此資料承駱為孺先生提供，不敢掠美，特致謝忱。

¹⁴ 此兩文原載香港大學中文學會編《中文學會輯識》第1卷第1號（1932年），原文不標總頁碼。〈易經要義〉共6頁，由〈易大象說〉、〈乾大象〉、〈坤大象〉三部分組成，文末有「待續」二字，故應尚有待刊部分未曾面世。〈周易揲著求卦法及經傳所載筮易占驗解說〉共5頁。鄧又同輯錄的《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將二文分別錄載（〈易經要義〉，頁35-40；〈周易揲著求卦法及經傳所載筮易占驗解說〉，頁40-45）。單周堯主編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八十周年紀念學術論文集》列〈周易揲著求卦法及經傳所載筮易占驗解說〉為〈易經要義〉的第四部分，將兩文併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頁7-12），則恐非作者原意。

¹⁵ 此文是區大典於1930—1931年間擔任香港大學中文學會首任會長時為香港大學中文學會所編《中文學會輯識》創刊號（第1卷第1號，1932年）撰寫的序言。文章的署名為「遺史氏」。鄧又同輯錄的《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載錄此文，頁45-46。

¹⁶ 鄧又同輯錄的《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載錄此文一詩，頁46。

¹⁷ 遺史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經學講義》（香港：奇雅中西印務，1930年）。

¹⁸ 區大典編：《史略》（香港：香港香遠印務，1921年）。此書覆印本得自蔡崇禧先生，特此致謝。

義——戰國至漢」與「區大典太史編」三項（參看圖一），故知書的編者為區大典，而書的性質為香港實業學堂漢文師範科第一年級講義，涵括的範圍自戰國迄漢。書的封面內頁左上角有「民國十年」、「區大典太史編」與「敬之誌」三行題字（參看圖二），所以知道此書在 1921 年時已被應用，而書的使用者為「敬之」。此書一冊兩卷，線裝印刷，每半頁十四行，每行三十二字，句讀或括號各佔半字位。每頁版心分三項：版心上端標「史略」二字，上下魚尾中列卷數、該卷簡目與該卷頁數，卷一的版心下端標「香港香遠印務承刊」（參看圖三）而卷二則標「香港荷李活道香遠印務刊」（參看圖四）。

《史略》一書書首有區大典執筆，題為「遺史氏輯」的〈讀史述略凡例〉，主要交代全書的體例與編排用心。書分兩卷，卷一為〈戰國至秦史略〉，而卷二則為〈秦至楚漢史略〉。全書敘事始於三家分晉，而止於楚敗漢勝。根據區大典〈讀史述略凡例〉的介紹，每卷均由政治、掌故與兵事輿地三部分組成。他的解說為：

昔馬端臨（1254—1323）有言，春秋以後，惟司馬遷（前 145—前 86？）號稱良史，作為〈紀〉、〈傳〉以述理亂興衰，〈書〉、〈表〉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史學備矣。茲之述略：首編〈政治〉，次編〈掌故〉，以備史體；終之以〈兵事輿地〉，以著歷代武功。蓋文事武備，勿庸偏廢也。¹⁹

根據此前設的安排，全書兩卷的內容各可被分為三部分：

（一）卷一〈戰國至秦史略〉的內容

此卷開章明義在標題下標出「因編述之便，以秦為經，以六國為緯」。²⁰全卷以「周威烈王（姬午，前 425—前 402 在位）二十三年（前 403），初，命晉大夫魏斯（魏文侯，？—前 396）、趙藉、韓虔為諸侯」²¹開始，而止於秦王政（秦始皇嬴政，前 259—前 210，前 246—前 210 在位）「二十六年（前 221），王賁自燕南攻齊，齊王建降。由是六國盡入於秦，混一區宇，而古制盡變矣。」²²此自是區大典所定的「政治」部分。

¹⁹ 同前註，〈讀史述略凡例〉，頁 1 上。

²⁰ 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1 上。

²¹ 同前註。

²² 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10 下。

緊接著的是〈附錄六國相攻事〉交代六國中魏、齊與燕、齊相攻伐的史事，²³而〈附錄六國秦燕趙禦戎事〉則揭示秦滅義渠、燕破東胡與趙敗匈奴諸史事。²⁴此自是區大典所定的「掌故」部分。

最後是〈七國地理圖說〉，分別就秦、韓、魏、趙、燕、齊、楚的疆域與軍事地理作頗詳細的介紹。²⁵卷末另附有「遺史氏訂，門人侯或華繪」的〈戰國兵事地理圖〉（參看圖五）。²⁶此自是區大典所定的「兵事輿地」部分。

（二）卷二〈秦至楚漢史略〉的內容

此卷述秦的先世、秦始皇的舉措、秦二世（胡亥，前 230—前 207）的無道、陳涉（陳勝，？—前 208）等的反秦、楚漢的興起、趙高（？—前 207）的專寵、楚漢的分道伐秦，而以漢高祖（劉邦，前 256—前 195，前 202—前 195 在位）於霸上受子嬰（？—前 206）降，秦亡作結。文中尚列有〈二世無道〉、〈豪傑亡秦〉、〈楚漢之興〉、〈趙高專寵〉、〈楚漢分道伐秦〉諸小目以便閱讀。²⁷此自是區大典所定的「政治」部分。

緊接著的〈楚漢戰爭〉述劉邦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而項羽（項籍，前 232—前 202）則破關入秦、屠咸陽、弑義帝、違背「先入關者王之」的協議、立劉邦為漢王、分王諸將。這激起了劉邦與項羽的正面對抗。雙方經連番激戰，鬥智鬥力，爾虞我詐，而以項羽自劉烏江作結。²⁸此自是區大典所定的「掌故」部分。

最後是〈秦地理圖說〉，逐一介紹秦并六國後所設三十六郡與平百越後所增置四郡的轄境範圍。²⁹卷末另附有相關地圖（參看圖六）。³⁰此自是區大典所定的「兵事輿地」部分。

區大典的〈讀史述略凡例〉解釋他確立此體例的原因，說：

政治得失，《尚書》、《春秋》備矣。歷史紀傳，記事記言，實兼二書之旨。然斷

²³ 同前註，卷 1，〈附錄六國相攻事〉，頁 10 下-12 下。

²⁴ 同前註，卷 1，〈附錄六國秦燕趙禦戎事〉，頁 12 下-13 下。

²⁵ 同前註，卷 1，〈七國地理圖說〉，頁 14 上-17 下。

²⁶ 同前註，卷 1，〈七國地理圖說〉，頁 17 下後，不標頁碼。

²⁷ 同前註，卷 2，〈秦至楚漢史略〉，頁 1 上-11 下。

²⁸ 同前註，卷 2，〈楚漢戰爭〉，頁 11 下-20 下。

²⁹ 同前註，卷 2，〈秦地理圖說〉，頁 21 上-25 上。

³⁰ 同前註，卷 2，〈秦地理圖說〉，頁 25 下後，不標頁碼。

代為史，無以觀其會通。宋司馬溫公（司馬光，1019—1086），萃千餘年治迹，編為《通鑑》，垂後王法戒之資，洵乎其為資治也。袁氏樞（袁樞，1131—1205），更即其書分類編纂，成《紀事本末》一書，然後學者乃能推治亂之本原，以究其所終極，誠史學之梯航矣。茲編政治史，以紀事本末為經，歷史紀傳為緯，參伍錯綜，以明條貫。其託始戰國，蓋上承《春秋》，亦猶溫公《通鑑》旨也。

仲尼傳《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與子張言，則曰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所損益可知。與顏淵論為邦，則言損益四代禮樂。然則會通古今，損益禮制，掌故學其要矣。《史記》八書，言制度之祖；歷史表志，胥沿體例。杜《典》馬《考》鄭《志》，薈萃成書，然後歷代典章，燦然大備，後之言掌故者莫越焉。茲編掌故史，取材書志以揭其要，參考文獻以會其通。一代之經制，附於一代之史，此歷代史例也。制度必考古證今，以明因革損益，亦《史》、《漢》書志之體也。

自三代下文武既判，而《六韜》、《三略》，儒者罕言，職方無官，而九州山川，圖志久缺。要塞之疏防，武備之廢弛，斯為中國積弱之原，非細故也。《班史》始志地理，歷代史因之，國朝李申耆乃有《地理韻編》之作。沿革之圖，獨惜兵事無考。胡文忠（胡林翼，1812—1861）著《讀史兵略》，通諸地理。明季顧祖禹（1631—1692/1624—1680）著《讀史方輿紀要》，通諸兵事。二公皆有輿圖之輯，惟胡圖與《兵略》別行，於原著靡所附麗；顧圖附《紀要》之末，而論者或又病其疏。矧今茲海道大通，事變孔亟；鐵道之軌如織，航海之術日精，兵事、輿地之講求，更不容以須臾緩。茲就所編歷代史略，分附以輿圖。凡古今之地名，與夫九州之要害，行軍之軌轍，皆以說詳之，殆古人左圖右史之意。儻亦今日考古者所有事歟！³¹

這體例的確立固然有理有據，而政治、掌故與兵事輿地三部分相結合的安排，亦跟清末以來歷史科課程的發展要求相吻合。光緒二十九年（1904）清廷頒布《奏定中學堂章程》，章程的〈學科程度章第二〉載：

凡教歷史者，注意在發明實事之關係，辨文化之由來，使得省悟強弱興亡之故，以振發國民之志氣。³²

³¹ 同前註，〈讀史述略凡例〉，頁1上-1下。

³² 課程教材研究所編：《20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匯編：課程(教學)計劃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頁42。

中華民國在 1912 年 12 月公布的《小學校教則及課程表》則要求：

教授本國歷史，宜用圖畫、標本、地圖等物，使兒童想見當時之實況，尤宜與修身所授事項聯絡。³³

同時頒布的《中學校令施行規則》亦要求：

歷史要旨在使知歷史上重要事蹟，明於民族之進化、社會之變遷、邦國之盛衰，尤宜注意於政體之沿革，與民國建立之本。³⁴

這清楚顯示歷史科的課程要求已跟傳統「經史之學」的「史學」大相逕庭。發明史事的關係，辨析文化的由來，鑑知民族進化、社會變遷、邦國盛衰、政體沿革的因由，藉以振發國民的志氣，省悟政權強弱興亡的道理全都成了時代的新需求。區大典雖是一輩視民國為敵國的清遺民，³⁵卻不得不因應時勢與課程的需要、編寫適合自己講學用的歷史教科書。

四、區大典《史略》的特色

區大典編寫《史略》一書，全是時勢使然。因為英國於 1842 年 8 月 29 日藉《南京條約》在清廷手上取得香港後，³⁶雖無明確的教育政策，卻一直堅持以西方的學校制度為本，著意推行英語精英教育。³⁷但隨著清末民初大批南來人口的湧入，適合小學程度學生入讀

³³ 同前註，頁 64。

³⁴ 同前註，頁 69。

³⁵ 參看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3 月）一書。

³⁶ 《南京條約》訂明清廷割讓香港的條文為：「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褚德新、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 1 月，頁 70）

³⁷ 有關港英政府在香港推行英語精英教育的概況，可參看吳倫霓霞：〈教育的回顧（上篇）〉，載王廣武主編：《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 年 7 月），頁 431-444。此外，Carl T. Smith（施其樂，1918—2008）的“English-educated Chinese eli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的私辦漢文學校驟然激增。根據香港教育司署（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記錄，私辦漢文小學的數目短短一年間自 1910 年的 196 所增至 1911 年的 243 所，而當中不少更同時向民國政府登記註冊。這便使英國感到自己在香港的管治威權遭受挑戰。英國派駐香港的總督急忙於 1911 年 9 月成立半官方（semi-official）形式的「漢文小學教育委員會」（Board of Chinese Vernacular Primary Education），專責處理漢文小學教育的相關事宜。³⁸1913 年 8 月，香港政府頒布香港歷史上第一項教育條例——《一九一三年教育條例》（*Education Ordinance, 1913*），並解散「漢文小學教育委員會」。條例規定所有學生數目達十人的學校均須向香港政府註冊，違者可罰款五百元；而教育司則有權拒絕或取消任何學校的註冊。³⁹這條例直接影響不少私立漢文小學的命運。由於註冊學校必須聘用已受訓練的教師，故官立的香港實業專科學院（即香港實業學堂，Technical Institute）自 1914 年起開辦在職男子漢文師範班（Vernacular Teachers' Classes）與在職女子漢文師範班（Vernacular Teachers' Classes for Women），專責培訓漢文小學的男、女教師。入讀的學生均須修業三年，晚間上課。⁴⁰1919 年「五四」運動發生後，主管漢文師範班的漢文視學官針對國內日趨激烈的反孔（Anti-Confucian）言行，特意宣佈加強漢文師範班學生的經史課程。他們禮聘區大典擔任在職男子漢文師範班的經史教師，⁴¹而《史略》一書正是區大典在此情勢下為此等漢文師範班學生編寫的教材。

《史略》一書既是特定環境下的產物，它始於三家分晉的安排固然可以託詞借鑑《通鑑》。⁴²但事實卻是區大典為配合漢文視學官特有的要求，刻意編寫跟民國政府公布的小學歷史課程不盡相同的教學內容。1912 年 12 月民國政府頒布的《小學校教則及課程表》列明：

本國歷史要旨，在使兒童知國體之大要，兼養成國民之志操。

Hong Kong” (in Marjorie Topley ed.: *Hong Kong: the interaction of traditions and life in the towns*, Hong Kong: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5, pp.65-96) 亦有相關的論述。

³⁸ 參看 Anthony Edward Sweeting (施偉庭, 1938—2008) :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20.

³⁹ 參看 *Ibid*, pp.220-221, 283-288.

⁴⁰ 參看《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288；《香港舊事見聞錄》，頁 200-202。

⁴¹ 參看《香港舊事見聞錄》，頁 202。

⁴² 參看《史略》，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1 上。

本國歷史宜略授黃帝開國之功績，歷代偉人之言行，亞東文化之淵源，民國之建設，與近百年來中外之關係。⁴³

由於不必受制於任何課程規限，區大典便得以利用此難得的時機盡量展示個人的才識。儘管《史略》一書目前只保留了在職男子漢文師範班第一年級「戰國至漢」的一冊，書的內容與結構明顯表現了區大典的一番心思。全書兩卷，各可分為四部分，計：

卷次	政治史	掌故史	兵事輿地史	地圖
卷一	〈戰國至秦史略〉	〈附錄六國相攻事〉、 〈附錄六國秦燕趙禦戎事〉	〈七國地理圖說〉	〈戰國兵事地理圖〉
卷二	〈秦至楚漢史略〉	〈楚漢戰爭〉	〈秦地理圖說〉	〈秦地理圖〉（原圖缺標題，今據內容自擬）

書的內容刻意突顯兵事與地理的關係，而地圖的配備尤具心思。清末民初一窩蜂成書的中國通史，包括柳詒徵（1880—1956）於1902年出版的《歷代史略》、陳慶年於1904年出版的《中國歷史》、夏曾佑（1865—1924）於1904年至1906年出版的《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劉師培（1884—1920）於1905年至1906年出版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等均未著意於史地的關係與地圖的運用。⁴⁴趙玉森在1922年出版獲大專院審定、供中等學校使用的《新著本國史》時，便已在書首的〈新著本國史例言〉特別強調「研究歷史，不可沒有地圖，這書附入的歷代簡明輿圖很多」，⁴⁵以廣招徠。這可見時代的轉變，已令地圖成為當時歷史教科書的必備成分。較《新著本國史》早一年成書的《史略》雖以線裝形式出版，區大典卻能在每卷末頁附上洋紙印刷的地圖一幅。他更為書中俯拾即是眾多地名隨見隨註，在首見時以括號方式註明民初的地名與簡略位置，如「鄭（今華陰縣）」、⁴⁶「黔中（今貴州以東至湖南常德府）」。⁴⁷此外，他更以括號方式解釋學生或許

⁴³ 《20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匯編：課程(教學)計劃卷》，頁64。1916年1月頒布的《高等小學校令施行細則》亦有相類的申明，稱：「本國歷史要旨，在使兒童知國體之大要，兼養成國民之志操。本國歷史宜略授黃帝開國之功績，歷代偉人之言行，亞東文化治體之淵源與近百年來中外之關係。」（同書，頁97）

⁴⁴ 有關清末民初以來中國通史的編纂梗概，可參看趙梅春撰《二十世紀中國通史編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3月）一書。書的附表〈20世紀中國通史著作一覽表〉（頁315-325）對各種通史的出版年分臚列頗詳，甚便參考。

⁴⁵ 趙玉森編：《新著本國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5月），上冊，〈新著本國史例言〉，頁1。

⁴⁶ 《史略》，卷1，〈戰國至秦史略〉，頁2下。

不易明白的字詞，如「開阡陌（南北阡、東西陌）」⁴⁸等。這反映他不僅重視「左圖右史」相配合的教學功效，更能緊貼當時的教育發展趨勢，關注學生學習的效益。

《史略》一書除因重視兵事與地理的關係，刻意配備地圖而別具特色外，論者尤應重視全書以「謹案」、「案」或「按」的形式貫徹始終、以史帶論、先述後議，交代重要史事的發展與區大典個人見解的表述方式。由於此書罕見流傳，現特將全書各「謹案」、「案」與「按」的「案語」原文，結合相關史事的簡介，表列如下：

卷目	史事梗概	「謹案」/「案」/「按」原文
卷一 〈戰國至秦史略〉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⁴⁹	謹案：此為晉弱秦強，秦興周亡之兆。溫公託始之微意也。 ⁵⁰
卷一 〈戰國至秦史略〉	周安王（姬驕，前 401—前 376 在位）十一年（前 391），齊田和遷康公海上，篡齊。 十六年（前 386），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 二十六年（前 376），魏、韓、趙共廢晉靖公，分其地。 ⁵¹	謹案：此為春秋世卿專政之結果，齊篡晉分，諸侯積弱，均勢既破，秦乃崛興，漸恣兼并，而春秋終，戰國始矣。 ⁵²
卷一 〈戰國至秦史略〉	周顯王（姬扁，前 368—前 321 在位）七年，秦孝公（嬴渠梁，前 381—前 338，前 361—前 338 在位）立，任公孫鞅（商鞅，前 390？—前 338）變法。 ⁵³	謹案：商君新法，整齊嚴肅，秦以暴興。然傷恩薄厚，秦以促亡。鞅固興秦功首，亦亡秦罪魁也。 ⁵⁴
卷一 〈戰國至秦史略〉	商鞅破魏，逼魏獻河西地東徙，被封於商。周顯王三十一年（前 338），秦惠文王（嬴駘，？—前 311，前 337—前 311 在位）立，車裂商鞅。 ⁵⁵	謹案：秦兼并之術，以逼魏東徙為第一要策。河西既克，函谷既開，東制諸侯，建瓴成勢，秦之帝業基此矣。鞅雖被誅，功要不沒也。 ⁵⁶

⁴⁷ 同上註。

⁴⁸ 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3 上。

⁴⁹ 參看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2 上。

⁵⁰ 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2 上。

⁵¹ 參看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2 上。

⁵² 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2 上。

⁵³ 參看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2 下-3 上

⁵⁴ 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3 上。

⁵⁵ 參看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3 上-3 下。

⁵⁶ 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3 下。

卷目	史事梗概	「謹案」/「案」/「按」原文
卷一 〈戰國至秦史略〉	周顯王三十六年（前 333）至周慎 靚王（姬定，前 320—前 315 在位） 四年（前 317），蘇秦（？—前 284） 以合從聯六國制秦，而張儀（？— 前 310）則連衡助秦破六國。 ⁵⁷	案：秦兼吞之術，以商鞅徧魏東徙為第 一級，張儀連衡破合從為第二級。 ⁵⁸
卷一 〈戰國至秦史略〉	周赧王（姬延，前 287—前 256 在 位）二年（前 313），秦令司馬錯 攻取巴蜀；使張儀詐楚，促絕齊交 後，再破楚師，取楚漢中郡。韓、 魏復乘楚攻秦失利，南襲楚。 ⁵⁹	謹案：秦取巴蜀、漢中以制楚，此為兼 并第三級。 ⁶⁰
卷一 〈戰國至秦史略〉	周赧王四年（前 311），秦益使張 儀以連衡說楚、韓、齊、趙、燕諸 國。秦武王立，不喜張儀，張儀遂 去秦。六國自是背連衡而復合從。 ⁶¹	案：張儀連衡，為秦并六國根本之策。 其後范雎（？—255）之遠交近攻， 李斯（？—前 208）之離間六國君 臣，亦用是策也。 ⁶²
卷一 〈戰國至秦史略〉	周赧王六年（前 311）至四十五年 間，秦昭王（嬴稷，前 325—前 251， 寧 306—前 251 在位）任秦宣太后 （芈八子，秦惠文王妃，？—前 265）異父弟魏冉為相，薦白起（？— 前 257）為將，大破韓、魏、趙、 楚諸國。 ⁶³	案：魏冉相秦，雖無他奇策，然薦白起 為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秦 益強大，冉之功也。徧楚東徙，此 亦為秦兼并之第四級。 ⁶⁴
卷一 〈戰國至秦史略〉	秦昭王任范雎遠交近攻策，相繼伐 魏、趙，而白起功最大。 ⁶⁵	謹案：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實即連衡策 而善用之。遠交燕、齊、楚，近 攻三晉，此為秦兼并之第五級。 ⁶⁶
卷一 〈戰國至秦史略〉	秦莊襄王元年（前 249），滅二周。 此二周緣於周顯王二年（前 367）， 韓、趙分周為西周三邑與東周四 邑。 ⁶⁷	案：二周當函谷之衝，梗秦東出之道， 秦欲逞志中原，必先并二周，地勢 然也。 ⁶⁸

⁵⁷ 參看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3 下-4 下。

⁵⁸ 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4 下。

⁵⁹ 參看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5 上-5 下。

⁶⁰ 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5 下。

⁶¹ 參看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5 下-6 上。

⁶² 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6 上。

⁶³ 參看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6 上-7 上。

⁶⁴ 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7 上。

⁶⁵ 參看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7 上-8 下。

⁶⁶ 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8 下-9 上。

⁶⁷ 參看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9 上。

⁶⁸ 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9 下。

卷目	史事梗概	「謹案」/「案」/「按」原文
卷一 〈戰國至秦史略〉	秦莊襄王以呂不韋（？—前 235）為相國，用兵三晉。秦王政繼立，破楚、趙、魏、韓、衛合從，伐楚、魏。李斯諫逐客，獲召用，陰遣辯士說各諸侯。 ⁶⁹	按 ：李斯離間六國君臣，此為秦兼并之第六級。計彌巧，策彌卑矣。扶智任術，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所以二世亡也。 ⁷⁰
卷一 〈戰國至秦史略〉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 221），六國盡入於秦。 ⁷¹	按 ：秦并六國，始則偏魏、楚東徙，而東出無阻，南顧無憂；繼則連橫破從，遠交近攻，而六國次第就滅矣。六國之亡，始則輕秦，內闕自弱，而秦得坐承其弊；繼則畏秦，近者割地乞和，遠者固圍觀望。三晉與楚，日受秦毒，賂秦求安；燕、齊僻處東北，坐視不救，迨晉、楚滅而燕、齊亦亡矣。此得失之鑒也。 ⁷²
卷一 〈附錄六國相攻事〉	先述周顯王十五年（前 354）始魏、齊相攻致秦破魏而魏東徙事；再述周赧王元年（前 314）始齊、燕相攻終致田單破燕事。 ⁷³	案 ：魏、齊與燕、齊大戰爭，皆於秦與六國之興亡有密切之關係，故敘而錄之。 ⁷⁴
卷一 〈附錄六國秦燕趙禦戎事〉	先敘秦滅義渠，再述燕破東胡，末言趙敗匈奴諸史事。 ⁷⁵	按 ：北狄自三代至今日（今為內、外蒙古）皆為中國患，亦歷史一大關係，故附錄之。 ⁷⁶
卷一 〈七國地理圖說〉	詳細介紹秦、韓、魏、趙、燕、齊、楚七國疆域與軍事地理形勢。 ⁷⁷	案 ：秦獻、孝之初，河西屬魏。蘇秦言秦東有關（潼關）、河（黃河），則魏獻河西之後，秦地東已至河。范雎言秦左關（函關）、坂（嶠坂），則在取焦曲沃之後，秦地已包二周；又言北有代（代州）、馬（馬邑），代、馬屬趙，蓋侈言之。 ⁷⁸

⁶⁹ 參看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9 下-10 上。

⁷⁰ 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10 上。

⁷¹ 參看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10 上-10 下。

⁷² 同前註，卷 1，〈戰國至秦史略〉，頁 10 下。

⁷³ 參看同前註，卷 1，〈附錄六國相攻事〉，頁 10 下-12 下。

⁷⁴ 同前註，卷 1，〈附錄六國相攻事〉，頁 12 下。

⁷⁵ 參看同前註，卷 1，〈附錄秦燕趙禦戎事〉，頁 12 下-13 下。

⁷⁶ 同前註，卷 1，〈附錄秦燕趙禦戎事〉，頁 13 下。

⁷⁷ 參看同前註，卷 1，〈七國地理圖說〉，頁 14 上-17 上。

⁷⁸ 同前註，卷 1，〈七國地理圖說〉，頁 14 下。

卷目	史事梗概	「謹案」/「案」/「按」原文
		<p>案：韓邊界在宜陽，有伊闕山險（原註：伊闕山在洛陽西南二十里，在宜陽東北數十里），要害在上黨（原註：今潞安府），有太行山險。秦攻韓，必分兩路：一道河南，一道河北。⁷⁹</p> <p>案：魏以長城扼西河，為秦心腹病。自魏獻河東（原註：安邑）、河西（原註：上郡）地於秦，東徙大梁，而秦患移於韓、趙，又魏地濱黃河，故秦欲決諸口灌之，卒以引河灌大梁，滅魏。⁸⁰</p> <p>案：趙都邯鄲（原註：今縣），韓之上黨蔽之；南邊鄴（原註：彰德），魏之河內蔽之；西邊晉陽（原註：太原），魏之河東、韓之平陽蔽之。韓、魏破，而趙始被秦兵。又趙北邊代，秦道九原、雲中，入雁門，險遠難繼，句注之道，非行軍所宜也。⁸¹</p> <p>案：燕之南境有趙，又南境有韓、魏，故燕被秦兵，後於三晉。又秦道九原、雲中，趨上谷、漁陽，並塞北出，踰數千里，越趙而攻燕，此危道也。⁸²</p> <p>案：齊南界楚，西界三晉，與秦東西相望，故齊最後亡。然日視三晉與楚交被秦兵，不顧唇齒之勢，坐以待滅，齊之失計也。⁸³</p> <p>案：楚雄南服，北扼黽阨之塞（原註：信陽州東南九十里即信陽三關），齊、晉皆無如楚何。能制楚者惟秦，陸出武關，下穰宛（原註：鄧州南陽）；水浮江漢，趨荊、襄；</p>

⁷⁹ 同前註，卷1，〈七國地理圖說〉，頁15上。

⁸⁰ 同前註，卷1，〈七國地理圖說〉，頁15下。

⁸¹ 同前註，卷1，〈七國地理圖說〉，頁15下-16上。

⁸² 同前註，卷1，〈七國地理圖說〉，頁16上。

⁸³ 同前註，卷1，〈七國地理圖說〉，頁16下。

⁸⁴ 同前註，卷1，〈七國地理圖說〉，頁17上。

卷目	史事梗概	「謹案」/「案」/「按」原文
		皆居楚上游，制楚死命。楚一再東徙以避秦，地勢使然也。 ⁸⁴
卷二 〈秦至楚漢史略〉	先述秦先世，再述秦始皇并六國、稱皇帝、除諡法、以水德王、色尚黑、以十月為歲首、廢封建、設郡縣、車同軌、書同文諸事。 ⁸⁵	案：封建制，諸侯分治其國，公卿大夫各有采邑。地小世業，易於措施。畫井分田，授受不紊。郡縣疏闊，守令紛更，易滋奸詐。又周末兼并，貧富不均，地益難治。故封建廢而井田不可復行，其勢然也。封建、井田既廢，而古制一切盡變矣。 ⁸⁶
卷二 〈秦至楚漢史略〉	秦始皇銷天下兵，焚書坑儒，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於上郡。 ⁸⁷	案：始皇無道，莫有如焚書坑儒之甚者也。長子扶蘇，以諫坑儒，被逐在外。少子胡亥，親愛居內，乃得乘幾，陰謀奪適，寢以亡秦，殆坑儒之報也。 ⁸⁸
卷二 〈秦至楚漢史略〉	陳涉、吳廣（？一前 208）起兵於蕲，一呼百應，自王而擊秦，命吳叔西擊滎陽、陳人武臣北徇趙、鄧宗徇九江郡、周市北徇魏。 ⁸⁹	案：此陳涉行軍方略也。徇九江為後路防軍，徇趙魏為略地偏師，皆奇兵也。擊滎陽為牽制之師，擊秦為入穴之師，皆正兵也。 ⁹⁰
卷二 〈秦至楚漢史略〉	陳涉諸將戰死滎陽，陳涉亡。 ⁹¹	案：陳涉遣武臣（？一前 208）、周市略地，既已分離，而遣吳叔、周文去秦，又復蹉跎，故一敗塗地。 ⁹²
卷二 〈楚漢戰爭〉	韓信（？一前 196）擊魏王豹，陳船意欲渡臨晉（關名，在朝邑東），而以伏兵自夏陽（韓城縣南）以木罌渡軍襲安邑，擄豹而定魏；旋即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一舉破代。 ⁹³	按：漢以取道成皋、滎陽以距楚，為正兵；以取道河東、河北以破魏、趙、燕、齊，襲楚後，為奇兵。正兵憑險，主守；奇兵擊虛，主戰。楚王第有自將正兵，而無游擊奇兵，所以敗也。 ⁹⁴

⁸⁵ 參看同前註，卷 2，〈秦至楚漢史略〉，頁 1 上-1 下。

⁸⁶ 同前註，卷 2，〈秦至楚漢史略〉，頁 1 下。

⁸⁷ 參看同前註，卷 2，〈秦至楚漢史略〉，頁 1 下-2 上。

⁸⁸ 同前註，卷 2，〈秦至楚漢史略〉，頁 2 上。

⁸⁹ 參看同前註，卷 2，〈秦至楚漢史略〉，頁 4 下-5 上。

⁹⁰ 同前註，卷 2，〈秦至楚漢史略〉，頁 5 上。

⁹¹ 參看同前註，卷 2，〈秦至楚漢史略〉，頁 6 下-7 上。

⁹² 同前註，卷 2，〈秦至楚漢史略〉，頁 7 上。

⁹³ 參看同前註，卷 2，〈楚漢戰爭〉，頁 15 下。

⁹⁴ 同前註，卷 2，〈楚漢戰爭〉，頁 15 下。

卷目	史事梗概	「謹案」/「案」/「按」原文
卷二 〈楚漢戰爭〉	項羽使武涉游說韓信背漢、信不從；蒯徹以相人術說韓信背漢，力稱勇略震主者身危，亦被拒。 ⁹⁵	案：蒯徹之言，深明天下大勢。信此時猶不忍背漢，知後此言信反者誣也。 ⁹⁶
卷二 〈楚漢戰爭〉	漢初立算賦，令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以治庫兵車馬。 ⁹⁷	案：此口賦也。鄭康成（鄭玄，127—200）注《周禮》，所謂口率出泉是也。 ⁹⁸
卷二 〈楚漢戰爭〉	楚、漢議和，割鴻溝（滎陽東南）而中分天下。張良、陳平說劉邦合韓信、彭越（？—前196）軍追擊項羽，韓、彭不與，至漢王分地王二人，二人以兵會。 ⁹⁹	案：此信、越所以見忌於高帝也。蒯醜之禍兆此矣。 ¹⁰⁰
卷二 〈楚漢戰爭〉	項羽垓下戰敗，烏江自刎，漢王馳至定陶，奪韓信軍而更立韓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諸侯及將相共尊漢王為皇帝。 ¹⁰¹	案：楚、漢成敗，地利、人謀為之也。漢據天下上游，滎城以西，四面阻塞，滎城以東，四達無險，此地利關係也。南服九江，北定河朔。漢軍梗其前，彭越擾其後。漢與眾兵強，楚備多力分，此人謀關係也。若夫漢兵所至禁虜掠，楚兵所過悉殘破，此仁暴之分，尤成敗之本也。 ¹⁰²

全書「案語」，卷一佔二十一則、卷二佔九則，合共三十則。當中二十則用於論析秦國與秦朝的史事，而卷一佔十八則、卷二則佔兩則。區大典在卷一〈戰國至秦史略〉部分先以十則「案語」逐一分析秦自商鞅變法至成功一統天下的每一關鍵點，再在卷一〈七國地理圖說〉以全部七則「案語」分析秦國的軍事地理形勢，探討六國未能盡用本國地理優勢而終為秦國消滅的原委。卷二〈秦至楚漢史略〉的四則「案語」，第一則從制度興廢的層面點出秦國混一六合緣於封建制與井田制的徹底破壞，亦旨在解釋秦國成功的因由。第

⁹⁵ 參看同前註，卷2，〈楚漢戰爭〉，頁19上。

⁹⁶ 同前註，卷2，〈楚漢戰爭〉，頁19上。

⁹⁷ 參看同前註，卷2，〈楚漢戰爭〉，頁19下。

⁹⁸ 同前註，卷2，〈楚漢戰爭〉，頁19下。

⁹⁹ 參看同前註，卷2，〈楚漢戰爭〉，頁19下。

¹⁰⁰ 同前註，卷2，〈楚漢戰爭〉，頁20上。

¹⁰¹ 參看同前註，卷2，〈楚漢戰爭〉，頁20上-20下。

¹⁰² 同前註，卷2，〈楚漢戰爭〉，頁20下。

二則力斥秦始皇無道，焚書坑儒，終致亡秦；第三、四則就陳涉用兵的方略提出己見，正好反映他對秦政無道的不滿。他在卷二〈楚漢戰爭〉列出的五則「案語」，第一則與第五則論析楚漢相爭劉邦用兵致勝的原因，而尤著意於地理與人謀的因素。其餘三則，兩則略論韓信不願背漢；一則提及漢的算賦，俱無甚足觀。整體而言，全書「案語」偏重析秦、著意軍事、究心地理，而致力於闡釋興亡、成敗的要道。卷一〈附錄秦燕趙禦戎事〉的唯一一則「案語」：

北狄自三代至今日（原註：今為內外蒙古）皆為中國患，亦歷史一大關係，故附錄之。¹⁰³

輕描淡寫，看似漫不經心而實在別具深意，相信與民國初年的政局發展不無關係。可惜礙於全書僅存此冊，今已無法細加印證。但他在語句中隱隱流露的感慨，卻絕不容忽視。

五、結語

自民國成立以來，「清季翰苑中人、寓港者無慮十餘輩，或以文鳴，或以學顯。」¹⁰⁴區大典便是「以經學顯」的一位。他雖因緣際會供職於英國人管治下的文教機構，卻對清室一直念念不忘。他不善唱詠，仍以清遺民的身分參與陳伯陶（1855—1930）等於1916年（丙辰）秋在九龍城宋王臺祭祀宋末宗室趙秋曉（1245—1294）的活動。¹⁰⁵他在民國建立後一直努力在經學著述中避用清諱。¹⁰⁶他的經學解說，論者或以為缺乏創意與時代意識。¹⁰⁷但他的《史略》雖只是一冊供在職男子漢文師範班學生使用的歷史教科書，卻處處在短短的篇幅中流露出他的豐富學問與過人識見。¹⁰⁸由於「歷史教科書是學校中歷史教學

¹⁰³ 同前註，卷1，〈附錄秦燕趙禦戎事〉，頁13下。

¹⁰⁴ 賴際熙撰、羅香林（1906—1978）輯：《荔垞文存》（香港：學海書樓，2000年），羅香林〈故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院長賴煥文先生傳〉，頁165。

¹⁰⁵ 參看蘇澤東編《宋臺秋唱》（廣東：粵東編譯公司刊本，1917年）一書。

¹⁰⁶ 參看遺史輯：《孝經通義》（香港：奇雅中西印務，1930年），頁1上。

¹⁰⁷ 參看《陳君葆日記》，頁133。

¹⁰⁸ 陳君葆在1937年7月23日下午得知他的老師區大典已在當天早晨辭世後，曾感慨「徽師（區大典）一生事業雖不若荔老（賴際熙），然學問著述則較豐富，惜其鬱鬱以終，可悲也。」

最重要的媒介」¹⁰⁹，而歷史教學又是歷史教育的重要表現方式。論者嘗以為：

歷史教育可使人類了解過去，認識現狀，預見未來，幫助人們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歷史教育可促進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歷史教育還可塑造合乎社會需要的人才，因而歷史教育受到所有社會、民族和國家的重視。¹¹⁰

肩負歷史教學重責的教科書便是協助學生產生社會認同的重要媒介，是以「教科書必須把集體記憶的力量帶進過去的陳述中，配上活生生的傳統、希望；並表現出過去是當下生活中的要素。」¹¹¹這便使歷史教科書編撰者的歷史意識成了關係歷史教育成效的重要因素。論者嘗指出：

歷史意識是記憶的表現和顯示。其特徵表現在：過去作為過去的存在這個事實，也就是說，過去的質與現在不同，同時，又與現在相關。歷史意識是記憶的精心傑作（elaboration of memory），又超過了人類經驗的限制，並超越人自身短暫而有限的生命限度。它強調質的時間差異，同時，透過講述一個沿著時間之流航行的故事來連接這些差異；這時間之流結合過去、現在和未來，成為一個包含延續和變遷、差異和同一、斷裂和持續及他性（otherness）和自性（selfhood）之廣泛的共同體。從過去到現在（包含對未來的觀點）的這種關係的原則，是當代變遷（temporal change）之意義和重要性之準則。歷史意識是由當代變遷的經驗所構成的，刺激現實生活中所預設的定位，並挑戰新的定位。所以，它的功能非常實際：對人類的活動（activity）及受苦於（suffering）當代變遷，提供意義及重要性的模型。¹¹²

區大典在別具時代意義的環境下，被委任為香港實業學堂男子漢文師範班的歷史科教師。他獲得當時的漢文視學官首肯，享有自由擬定講授內容的特權。《史略》一書自是他用心

（《陳君葆日記》，頁 296）

¹⁰⁹ Joern_Ruesen 撰，陳中芷譯：〈歷史意識作為歷史教科書研究之事項〉，載張元、周樑楷主編：《方法論：歷史意識與歷史教科書的分析編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1998年6月），頁 19。

¹¹⁰ 姬秉新主編：《歷史教育學概論》（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7年8月），何瑞春〈歷史教育論〉，頁 41。

¹¹¹ Joern_Ruesen 撰，陳中芷譯：〈歷史意識作為歷史教科書研究之事項〉，頁 21。

¹¹² 同上文，頁 23-24。

擘畫的講課心得。他在時限的選取、課題的構思、「案語」的確定等方面都顯出心思。他事事從地理與軍事的視角出發，暢論興衰、成敗的要道，而尤著意於用兵的成效。個中自不無針對當前世局的應用價值。他鄭重提出「要塞之疏防，武備之廢弛，斯為中國積弱之原」¹¹³的見解，無疑已將過往「古為今用」的史學思想推進為應世實用的歷史思維。這難道不是經學家——特別是遺民經學家經世思想付諸應用的一例嗎？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日初稿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次稿

二〇一二年一月八日三稿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日改定

¹¹³ 《史略》，〈讀史述略凡例〉，頁1下。

圖一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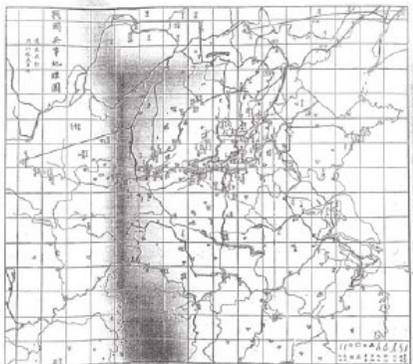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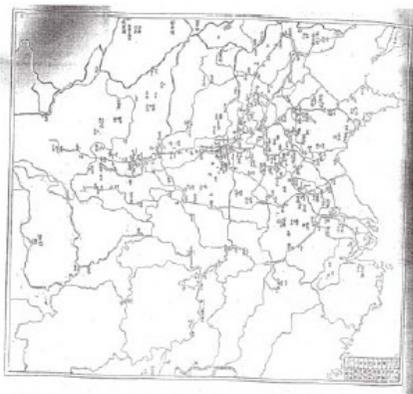
圖四



圖五



圖六



徵引文獻

近人論著

- *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6年9月）。
- 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10月）。
- 左玉河：《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
- 李紀祥：《時間·歷史·敘事——史學傳統與歷史理論再思》（臺北：麥田出版，2001年9月）。
- 岑光樾撰，岑公焯編：《鶴禪集》（香港：自印本，1984年）。
- 吳倫霓霞：〈教育的回顧（上篇）〉，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7月），頁431-444。
-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3月）。
- 單周堯主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八十周年紀念學術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
- 孫艷：〈明、清遺民詩人評價褒貶懸殊原因簡析——以顧炎武、沈曾植為例〉，《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2010年5月），頁60-64。
- 陳以愛：〈《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一份「新國學」的研究綱領〉，黃清連編：《結網編》（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頁519-571。
- 陳君葆撰、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年4月）。
- * 陳謙：《香港舊事見聞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
- 彭海鈴：《汪兆鏞與近代粵澳文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
- * 區大典編：《史略》（香港：香港香遠印務，1921？年）。
- 區志堅：〈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背景之研究〉，《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第4期（2006年），頁29-57。
- 程美寶：〈庚子賠款與香港大學的中文教育——二三十年代香港與中英關係的一個側面〉，《中山大學學報》，第6期（1998年12月），頁60-73。
- 褚德新、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 趙玉森編：《新著本國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5月）。
- 趙梅春：《二十世紀中國通史編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3月）。

- 課程教材研究所編：《20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匯編：課程（教學）計劃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
- 賴際熙撰、羅香林輯：《荔垞文存》（香港：學海書樓，2000年）。
- * 鄧又同輯錄：《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香港：學海書樓，1991年11月）。
- 遺史輯：《孝經通義》（香港：奇雅中西印務，1930?年）。
- * 蘇澤東編：《宋臺秋唱》（廣東：粵東編譯公司刊本，1917年）。
- Joern_Ruesen 撰，陳中芷譯：〈歷史意識作為歷史教科書研究之事項〉，張元、周樑楷主編：《方法論：歷史意識與歷史教科書的分析編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1998年6月），頁19-36。
- Frederick J. D. Lugard, "Memo. By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Enclosure 8 of C.P. Carter: *Report of Sub-committee: Hongkong, 25th September, 1908*, Hong Kong, Committe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versity for Hong Kong: *Papers relative to the proposed Hongkong University*. Hong Kong: Noronha & Co., 1908, pp. 16-19.
- Frederick J. D. Lugard, *Souvenir presented by Sir Hormusjee N. Mody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Hongkong University to commemorate the laying of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the Hongkong University building by His Excellency Sir F. J. D. Lugard, K.C.M.G., C.B., D.S.O., Governor of the Colony on Wednesday, 16th March, 1910* (reprinted with speeches at the ceremony, and illustrations, Hong Kong: Noronha & Co., 1910, pp.4-5.
- * Carl T. Smith, "English-educated Chinese eli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Hong Kong", Marjorie Topley ed.: *Hong Kong: the interaction of traditions and life in the towns*. Hong Kong: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5, pp.65-96.
- * Anthony Edward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lendar, 1913-14. Hong Kong: The Newspaper Enterprise Ltd., 1914.
-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lendar, 1914-15. Hong Kong: The Newspaper Enterprise Ltd., 1915.
-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lendar, 1926. Hong Kong: The Newspaper Enterprise Ltd., 1926.
-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lendar, 1927. Hong Kong: The Newspaper Enterprise Ltd., 1927.

（說明：徵引文獻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en Qian, *Xianggang jiu shi jian wen lu*.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1989.

Deng Youtong (ed.), *Xuehai shulou zhujiang hanlin wenchao*. Xianggang: Xue hai shu lou, 1991.

Ou Dadian(ed.), *Shilue*. Xianggang: Xiangyuan yinwu, 1921 ? .

Su Zedong (ed.), *Song tai qiu chang*. Guangdong: Yuedong bianyi qongsi, 1917.

Wong Chai-lok,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1996.

Carl T. Smith, "English-educated Chinese eli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Hong Kong", Marjorie Topley ed.: *Hong Kong: the interaction of traditions and life in the towns*. Hong Kong: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5, pp.65-96.

Anthony Edward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Historical views of Qing Confucian Loyalists in Hong Kong: a study of Ou Dadian's *Shilue*

Hui, Chun-hing

(Received September 30, 2011; Accepted December 16, 2011)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ny former Qing subjects employed different means to express their pro-Qing political and moral stance. Those from Guangdong gradually migrated to Hong Kong, which was ceded to Britai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Opium War, because of th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of the two places. Under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they formed a unique 'social circle' dedicated to academic study, literary creation and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works and local chronicles, with emphasis being laid on education and the spreading of Confucian thought. Ou Dadian (1877-1937), a scholar who had spent a considerable period of time on the teaching of Confucian classical studies, was one of these migrants. His twelve publications o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one on the book *Laozi* all receiv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This article seeks to examine the historical views of this migrant Confucian scholar articulated during his stay in Hong Kong through the rarely found history textbook, i.e. "*Shilue*".

Keywords: Qing Loyalists, Confucian scholar,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u Dadian
Shilue